

# 論 寫 作

关于寫作問題論文选編

沈阳市公安局业余大学編

1962年3月



## 說 明

这里选輯了一些論写作的文章，目的是为了帮助我局干警学习写作方法，提高文字工作的水平。

选輯的文章，包括文風的評論、政論文、应用文和通訊报导的写作方法、經驗以及語法修辞几个方面，这些都是和我们机关工作关系比較密切的。关于其它文学体裁写作方面的文章都沒有选入。

选輯的文章中有一部分是以新聞工作者为对象的，但所談的写作方面的問題对我们也很有参考价值。

本書編选如有不当之处，望指正。

沈阳市公安局业余大学

一九六二年 三 月

## 目 录

毛泽东同志論文风·····	1
关于文风問題·····	郭沫若···5
在写文件方法座談会上的講話·····	胡乔木···8
关于写文章·····	施东向···19
义理、考据和辞章·····	施东向···21
分析綜合与典型問題·····	陈伯达···24
思想、感情、文采·····	陶 鑄···28
集体写作五年·····	龔同文···32
怎样写报告·····	王 翊···36
关于評論写作的几个問題·····	“新聞战綫”編輯室···45
抓住特点，具体地說明特点——关于通訊写作·····	华 山···48
談通訊报道·····	周立波···65
論特写·····	刘白羽···68
文学語言問題·····	老 舍···83
談談語法修辭·····	叶圣陶···89

# 毛澤東同志論文風

**党八股的几种表現。党八股是小資產階級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一種表現形式。**

我們有些同志歡喜寫長文章，但是沒有什麼內容，真是“懶婆娘的裹腳，又長又臭”。為什麼一定要寫得那麼長，又那麼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種解釋，就是下決心不要群眾看。因為長而且空，群眾見了就搖頭，那裏還肯看下去呢？只好去欺負幼稚的人，在他們中間散布壞影響，造成壞習慣。

有些党八股，不只是空話連篇，而且裝樣子故意嚇人，這里面包含着很壞的毒素。空話連篇，言之無物，還可以說是幼稚；裝腔作勢，借以嚇人，則不但是幼稚，簡直是無賴了。魯迅曾經批評過這種人，他說：“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科學的東西，隨便什麼時候都是不怕人家批評的，因為科學是真理，決不怕人家駁。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東西，表現在党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說里面，却生怕人家駁，非常胆怯，于是就靠裝樣子嚇人；以為這一嚇，人家就會閉口，自己就可以“得勝回朝”了。這種裝腔作勢的東西，不能反映真理，而是妨害真理的。

你們去看一看中藥鋪，那裏的藥櫃子上有許多抽屜格子，每個格子上面貼着藥名，當歸、熟地、大黃、芒硝，應有盡有。這個方法，也被我們的同志學到了。寫文章，做演說，著書，寫報告，第一是大壹貳叁肆，第二是小一二三四，第三是甲乙丙丁，第四是子丑寅卯，還有大A B C D，小a b c d，還有阿拉伯數字，多得很！幸亏古人和外國人替我們造好了這許多符號，使我們開起中藥鋪來毫不費力。一篇文章充滿了這些符號，不提出問題，不分析問題，不解決問題，不表示贊成什麼，反對什麼，說來說去還是一個中藥鋪，沒有什麼真切的內容。我不是說甲乙丙丁等字不能用，而是說那種對待問題的方法不對。現在許多同志津津有味於這個開中藥鋪的方法，實在是一種最低級、最幼稚、最庸俗的方法。這種方法就是形式主義的方法，是按照事物的外部標志來分類，不是按照事物的內部聯系來分類的。單單按照事物的外部標志，使用一大堆互相沒有內部聯系的概念，排列成一篇文章、一篇演說或一個報告，這種辦法，他自己是在做概念的遊戲，也會引導人家都做這類遊戲，使人不用腦筋想問題，不去思考事物的本質，而滿足於甲乙丙丁的現象羅列。

許多人寫文章，做演說，可以不要預先研究，不要預先準備；文章寫好之後，也不多看幾遍，象洗臉之後再照照鏡子一樣，就馬馬虎虎地發表出去。其結果，往往是“下筆千言，離題萬里”，仿佛象個才子，實則到處害人。這種責任心薄弱的壞習慣，必須改正才好。



小資產階級革命分子的狂熱性和片面性，如果不加以節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產生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它的一種表現形式就是洋八股，或黨八股。

（“反對黨八股”）

**論揭穿和打倒黨八股的重要性。黨八股是阻礙革命、阻礙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發展的東西。**

一個人寫黨八股，如果只給自己看，那倒還不要緊。如果送給第二個人看，人數多了一倍，已屬害人不淺。如果還要貼在牆上，或付油印，或登上报紙，或印成一本書，那問題可就大了，它就可以影響許多的人。而寫黨八股的人們，却總是想寫給許多人看的。這就非加以揭穿，把它打倒不可。

“五四”時期的生動活潑的、前進的、革命的、反對封建主義的老八股、老教條的運動，後來被一些人發展到了它的反對方面，產生了新八股、新教條。它們不是生動活潑的東西，而是死硬的東西了；不是前進的東西，而是後退的東西了；不是革命的東西，而是阻礙革命的東西了。

我們黨內一部分（當然只是一部分）同志所中的黨八股的毒，所犯的教條主義的錯誤，如果不除去，那末，生動活潑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啟發，拿不正確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惡習就不能肅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就不能得到廣泛的傳播和發展；而對於老八股和老教條在全國人民中間的影響，以及洋八股和洋教條在全國許多人中間的影響，也就不能進行有力的鬥爭，也就達不到加以摧毀廓清的目的。

（“反對黨八股”）

**寫文章要看對象，要解決問題，要認真刪改。**

共產黨員如果真想做宣傳，就要看對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說、談話、寫字是給什麼人看、給什麼人聽的，否則就等於下決心不要人看，不要人聽。

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說，如果是重要的帶指導性質的，總得要提出一個什麼問題，接着加以分析，然後綜合起來，指明問題的性質，給以解決的辦法，這樣，就不是形式主義的方法所能濟事。

任何機關做決定，發指示，任何同志寫文章，做演說，一概要靠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要靠有用。

孔子提倡“再思”，韓愈也說“行成於思”，那是古代的事情。現在的事情，問題很複雜，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還不夠。魯迅說“至少看兩遍”，至多呢？他沒有說，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認真地加以刪改，然後發表。文章是客觀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複雜的，必須反復研究，才能反映恰當；在這裡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碼知識。

長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嗎？也不好。我們应当禁絕一切空話。但是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務，是把那些又長又臭的懶婆娘的裹腳，趕快扔到垃圾桶里去。俗語說：“到什麼山上唱什麼歌。”又說：“看菜吃飯，量体裁衣。”我們無論做什麼事都要看情形辦理，文章和演說也是這樣。我們反對的是空話連篇言之無物的八股調，不是說任何東西都以短為好。

（“反對黨八股”）

### 論學習群眾語言的重要性。語言必須正確、簡單和明了，要有中國的作風和中國的气派。

如果一篇文章，一個演說，顛來倒去，總是那幾個名詞，一套“學生腔”，沒有一點生動活潑的語言，這豈不是語言無味，面目可憎，象個癩三么？一個人七歲入小學，十幾歲入中學，二十多歲在學業畢業，沒有和群眾接觸過，語言不豐富，單純得很，那是難得的。但我們是革命黨，是為群眾辦事的，如果也不學群眾的語言，那就辦不好。

（“反對黨八股”）

許多同志愛說“大眾化”，但是什麼叫做大眾化呢？就是我們的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眾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應當認真學習群眾的語言。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為什麼語言要學，並且要用很大的氣力去學呢？因為語言這東西，不是隨便可以學好的，非下苦功不可。

第一，要向群眾學習語言。人民的語彙是很豐富的，生動活潑的，表現實際生活的。我們很多人沒有學好語言，所以我們在寫文章做演說時沒有幾句生動活潑切實有力的話，只有死板板的幾條筋，象癩三一樣，瘦得難看，不象一個健康的人。

第二，要從外國語言中吸收我們所需要的成份。我們不是硬搬或濫用外國語言，是要吸收外國語言中的好東西，於我們適用的東西。因為中國原有語彙不夠用，現在我們的語彙中就有許多是從外國吸收來的。例如今天開的幹部大會，這“幹部”兩個字，就是從外國學來的。我們還要多多吸收外國的新鮮東西，不但要吸收他們的進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們的新鮮用語。

第三，我們還要學習古人語言中有生命的東西。由於我們沒有努力學習語言，古人語言中的許多還有生氣的東西我們就沒有充分地合理地利用。當然我們堅決反對去用已經死了的語彙和典故，這是確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東西還是應該繼承。現在中黨八股毒太深的人，對於民間的、外國的、古人的語言中有用的東西，不肯下苦功去學，因此，群眾就不歡迎他們枯燥無味的宣傳，我們也不需要這樣癩腳的不中用的宣傳家。什麼是宣傳家？不但教員是宣傳家，新聞記者是宣傳家，文藝作者是宣傳家，我們的一切工作幹部也都是宣傳家。比如軍事指揮員，他們並不對外發宣言，但是他們要和士兵講話，要和人民接洽，這不是宣傳是什麼？一個人只要他對別人講話，他就是在做宣傳工作。只要他不是啞巴，他就總有幾句話要講的。所以我們的同志都非學習語言不可。

（“反對黨八股”）



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之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

（“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

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語言必須接近民眾，須知民眾就是革命文化的無限豐富的源泉。

（“新民主主義論”）

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農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們的幹部。什麼是不懂？語言不懂，就是說，對於人民群众的豐富的生動的語言，缺乏充分的知識。許多文藝工作者由於自己脫離群眾、生活空虛，當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語言，因此他們的作品不但顯得語言無味，而且里面常常夾着一些生造出來的和人民的語言相對立的三不四不的詞句。

我們可以大聲疾呼，而不要隱晦曲折，使人民大眾不易看懂。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報紙的文字應當生動，報刊編輯應當向作者提出寫生動文章的要求，並且幫助作者修改文章。**

我希望這個報紙好好地辦下去，多載些生動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沒味道，不起勁。

（“‘中國工人’發刊詞”）

我們既反對政治觀點錯誤的藝術品，也反對只有正確的政治觀點而沒有藝術力量的所謂“標語口號式”的傾向。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我們的許多同志，在寫文章的時候，十分愛好黨八股，不生動，不形象，使人看了頭痛。也不講究文法和修辭，愛好一種半文言半白話的體裁，有時廢話連篇，有時又盡量簡古，好像他們是立志要讓讀者受苦似的。本書中所收的一百七十多篇文章，有不少篇是帶有濃厚的黨八股氣的。經過幾次修改，才使它們較為好讀。雖然如此，還有少數作品仍然有些晦澀難懂。僅僅因為它們的內容重要，所以選錄了。那一年能讓我們少看一點令人頭痛的黨八股呢？這就要求我們的報紙和刊物的編輯同志注意這件事，向作者提出寫生動和通順的文章的要求，並且自己動手幫作者修改文章。

（“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中“合作社的政治工作”的按語）

（“新聞戰綫”編輯室輯錄，原載該刊1958年第二期）

# 关于文风问题

——答“新观察”记者问——

郭沫若

## 一、您认为怎样才能使文章写得准确、鲜明、生动？

答：文章是人写的，因此，首先是人的问题。古人说：“文如其人”，这是说什么样的人，就写什么样的文章。文章要写得准确、鲜明、生动，首先要看写文章的人的思想、立场、作风怎样。你的思想正确、态度鲜明、作风正派，那么，你写的文章也就有一定的准确性和鲜明性。这是基本问题。

其次，是文章本身的技巧问题，写文章有一定的技巧。要使文章写得好，恐怕总得懂一点逻辑、文法和修辞。写文章的目的是给人家看，不是给自己看的，所以不能只有你自己懂，主要是要使人懂。要把你的思想表达出来，传达给别人，你自己先要有准确的概念和见解，然后如实地表达出来。你所看到的客观事物，总要使得没有看到的人也浑如在眼前。而要做到这样，当然要懂得一点逻辑和文法，因为不合逻辑就不通，不合文法也就不通。

老实一点，是做到准确的好办法。不一定要苦心孤诣地去修饰。逻辑和文法，其实也就是老老实实的方法。我们平常讲话很少讲不通的话。这是因为讲话老实，有什么就讲什么。可是写起文章来，苦心孤诣地一经营，往往弄巧反拙。如果是老实地用最适当的字眼把你看到的、想到的写出来，就比较准确；一加不恰当的修饰，反而不准确了。现在一般的毛病是爱修饰，修饰得恰当当然好，修饰得不好可就糟糕了。

要使文章生动，我想少用形容词是一个秘诀。现在有些文章有个毛病，就是爱堆砌形容词，而且总是爱用最高级的形容词。如形容一个人的美，就说“非常非常的美”或“极端极端的美”。又如“六万万人正以排山倒海、乘风破浪之势……”这样的句子，就有点不恰当。把山移开、海翻过来，那是多么大的形势，同“乘风破浪”不能相比。所以，既然已有“排山倒海”，就不应再用“乘风破浪”了。

总之，写文章要老实一点，朴素一点。看到什么，想到什么，就写什么。自己的思想认识明确，然后适当地表达出来，就一定会准确。

对于鲜明，在一般情况下，只要是准确的，大概也是鲜明的。另外，文章要具有鲜明性，恐怕在选择词句、字眼上面还得用一点心。不要选用深奥的、外国式的词句。象胡风、冯雪峰那样的文章，看了就是不懂。句法构成要老实一点，要合乎中国话的一般规律。用字有个秘诀，就是选现代的概念明确的字，不要找太偏僻的字；偏僻的字不明确，人家也不容易懂；含混的——这样可以解释、那样也可以解释的字最好避而不用。用明确的而不是模棱两可的字来表达，就可以收到鲜明的效果。



句法和章段一定要分清楚。古人的文章不分段，不分节，这不是好办法。欧洲人写文章讲究章法，我們学过来是很好的。章法清楚，就给人以鮮明的印象。

标点一定要恰当。标点好象一个人的五官，不能因为它不是字就看得无足輕重。标点錯了，意义也就变了。

文章有各种各样的体裁。根据我自己的經驗，大体上句子不宜太長，段节也不宜太長。这样就容易清楚，人家看来一目了然，也就自然鮮明了。

生动性也一样。要是句子短些，章节短些，文章就生动活泼。比如新詩是分行写的，不是整整一大篇的排出来，这有它的好处和妙处。繪画要留些适当的空白，我想写文章也同样适用。行与行之間、标点与标点之間有些空白，就給人一个清楚的感觉。

无论准确也好，鮮明、生动也好，就語言方面讲，要求字眼总要用得适如其量。这样，表現的概念才会准确，也才能使人感到鮮明。說得神秘一点，字眼里面还有它的声調和色彩。法国有个作家叫福楼拜，很讲究字眼，他写了文章要用鋼琴来檢查字眼，听听声音是否和諧。所以，在选择字眼方面恐怕要費点功夫。所謂錘炼，大概就是在这些地方力求准确、鮮明、生动，使人家更容易了解你的内容和概念。

文章写好后，要翻来复去的推敲一下。“推敲”这两字的出处大家都知道，原来是“僧推月下門”，后来改成“僧敲月下門。”“敲”和“推”的动作本来不一样。再說寺門掩閉，恐怕敲的可能性多些，“敲”字的声音也更响亮一些。两下一比較，就可以看出“敲”的好处。所以文章写好后多推敲、琢磨是必要的。所謂千錘百炼，不一定要“錘”千次“炼”百次，但象毛主席說的看它个三次，总还是要的吧。我們有时候太着急，写好了連过目都不过，結果就出了差錯。

这里說的准确、鮮明、生动，主要是指理論性、叙述体的文章，至于文艺性的文章如詩詞之类，有时候要稍微不同一点。我不准备多說。

## 二、文风問題是不是單純的語言問題，它同思想和思想方法的关系怎样？

答：文风問題，剛才已經讲过，不是單純的語言問題，主要还是思想和思想方法的問題。首先要你的思想、概念准确，然后才能写出准确的文章。要是以己之昏昏，也就当然使他人昏昏了。古人說“文以載道”，用現在的話說，写文章就是表达思想。所以思想是“文”的骨干和核心，关系很重大。

文风同思想方法关系也是很密切的。象邏輯、唯物辯証法等都是思想方法，如果思路不通，也断断写不出好文章。不合邏輯就是不通。至于辯証法，那是更高一級的邏輯，即所謂辯証邏輯，它是更全面地从发展上、关系上和本质上来看問題，使思想更有邏輯性。

你总先要有这样的胚子——思想和思想方法，然后才能进入第二步——用适当的形式和語言把它表达出来。就語言讲，它可以为任何階級服务，但如果你的思想是資產階級思想，你的語言所表达出来的东西决脫离不了資產階級思想的范疇，反之亦是。这就充分証明文风問題不單純是語言問題。

思想和語言有一定的关連，这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内容决定形式。通过无产階級思想选用的語言，一定接近于无产階級的。我們可以从无产階級的有生命的語言中，找到能够准确地表达我們思想的工具。要做好文章，主要的要努力把内容和形式和諧地統一起来。随着时代的不同語言在逐漸的改变，文风也在跟着转变。所以文风問題不是單純的語言問題，它

同思想和思想方法有密切的关系。

### 三、在文风上，您認為应该从毛主席的文章中学习哪些东西？

答：毛主席的文章，正如开头所说的“文如其人”——非常平易近人。主席的文章和他讲话一样，谁都看得懂，而且喜欢看。听了毛主席讲话，好象热天吃了冰淇淋，又好象疲倦后喝了一杯热茶。他的文章和讲话就是平易近人。毛主席说的话非常准确，想说什么就明明白白的告诉你。毛主席的文章很生动，很形象化，思想内容很艰深的問題，到了毛主席的笔下和嘴里，就变得非常容易懂。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深入浅出。我们学习毛主席的文章，就要学习他的平易近人，学习他的深入浅出，学习他准确、鮮明、生动地表达艰深思想的能力。

毛主席的文章写得那么平易近人，也许有人问是不是毫不经意的？那也不见得。毛主席说过，有些同志写文章就存心不要人家懂。而毛主席写文章却是连标点也不放松，存心要人家懂。正因为苦心孤诣为读的人着想，才写得出这样的文章。记得1949年第一届全国政协产生的几个宪章和宣言，主席亲自校对，一个标点不让它出错。这种对文章认真负责的精神，同样值得我们学习。你不肯在字法、句法、章法、标点上下苦功锤炼，要想一步登天，达到主席那样，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主席的文章是经过千锤百炼的。所谓“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毛主席的文章可以说就是这样。毛主席在思想上经过艰苦锻炼的阶段，在文字上也一定经过艰苦锻炼的阶段。我喜欢毛主席这种文章的路子，还有另外一种路子，就是故意把文章写得深奥，这是走的邪路。这样的文章我是不大欣赏的。汉朝的杨雄就是以“艰深文浅陋”见称。明明很简单的话，他要用孤僻的字眼写出来。现代中国也有这一派。这一派的文章很不值得欢迎。

学习毛主席的文章，要学习他的平易近人、深入浅出、概念准确、形象鮮明、笔调生动，这些都是必要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学习毛主席的为人。只有在思想和思想方法上经过苦心的锻炼，才能把文章写得好。

### 四、本刊最近正在提倡多写短小的文章，您觉得怎么样？有人说短小的文章没有分量，您觉得这种看法对吗？

答：文章总是“有话即长，无话则短”。要说的东西多，就长一点；说的东西不多，就短一点。我是喜欢短文章的，但我也并不反对长文章。有内容的长文章是好的，就怕象王大媽的裹脚布——又长又臭，那实在受不了。

文章最好是用最经济的办法，把你想说的东西说出来。所谓“要言不繁”。把可有可无的字去掉。当然，更不用说可有可无的句、章、节了。这样的文章才会受欢迎，才有可能成为好文章。

现在大家都很忙，短文章是最适时的。把说的事情简单、明了、准确的说出来，让读的人不要花很多时间就有所得，这是最好的。拖拖拉拉的长篇大论，实在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看。至于有内容的大著作，如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更长，也是值得读的。

短文章就没有分量，那不见得。文章不在长短，要看内容如何。内容有分量，尽管文章短小，也是有分量的；如果内容没有分量，尽管写得象万里长城那样长，还是没有分量。所以不能用量压人，要讲求质。黄金只有一点点，但还是有它的分量的；牛粪虽然一大堆，分



量却不見得有多重。我們四川还有人用牛糞作肥料，至于那些又臭又長的文章，恐怕連牛糞也不如。写毫无內容的冗長不堪的文章，在今天來說，是一种犯罪的行为，浪費自己的時間不說，还浪費了紙張，浪費了排字工人的時間，浪費了所有讀者的時間，过失实在不小！

为了医治这个毛病，提倡写短文章倒是个好办法。我建議：你們訂稿費标准时，不一定要根据字数；好的短文章多給一点稿費，因为短而好的文章，写起来很費時間；長而不好的文章根本就不需要它；長而可用的文章，就少給点稿費。这样做有好处，可以把毛病給医治一下。

說短文章沒有分量是不切实际的。中国古代就有許多短文章，如《論語》、《道德經》等。《論語》中有不少好的东西；就是《道德經》，在那个历史时代也有它突出的地方。拿民間語言來說，很多生动的諺語都是既短小而又內容。“三个臭皮匠，湊成一个諸葛亮”，这样的话就很好。它十几个字抵得过一大篇文章。类似的例子有的是。簡短，又有內容，就可以多、快、好、省。多是懂的人多，不是文字多；快是懂得快；好是內容好；省是大家省時間。

让我再說一遍，我是并不反对長文章的，尤其是要写重大的問題或重大的理論，那是非長不可的。但即使必須写長文章，也要遵守經濟的原則，应当長就長，应当短就短。《庄子》上有这样几句话：“鳧脛虽短，續之則悲；鶴脛虽長，断之則哀。”这同样适用于写文章。可是就今天的文风來說，把水鴨子（鳧）的脚加長的文章太多了。《新观察》今天提倡多写短文章，是适时的。

(1958年3月21日)

## 在写文件方法座談会上的講話

(这个記錄，未經审閱，仅供参考)

胡 乔 木

中央下了个命令，要我来講一下写文件里面的一些問題，怎样能够实现毛主席在“六十条”里面提出的要求，先声明我講不好，只是提些意見，作为参考。写文件和做工作差不多，叫个人来談怎样把工作做好，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文章怎么叫好，怎么叫不好，里面道理很多；我知道的有限，如何使文章按中央的要求能够让人看下去，我想談四个問題：

1. 对这个問題的看法、認識；
2. 准确性、鮮明性、生动性的問題；
3. 看条件：什么样文章，給什么人看，要求不同；
4. 怎么办？用什么方法，可以比較快地达到目的。

現在分別談一下：

## 一、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工作方法六十条”中除37条专门讲这个问题外，还有三十二条、三十三条、三十六条、四十二条、四十三条、四十七条也讲到了这个问题。三十二条是说“开会的方法，应当是材料和观点的统一。把材料和观点割断，讲材料的时候没有观点，讲观点的时候没有材料，材料和观点互不联系，这是很坏的方法。只提出一大堆材料，不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说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种方法更坏。”三十三条是说“要彼此有共同的语言，必须先有必要的共同的情报知识”。三十六条是说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四十二条、四十三条是说学点文学、文法和逻辑。四十七条是说要培养“秀才”，“这些人要较多地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词章修养”。这说明中央对这个问题是重视的，为什么要重视这个问题？应该从政治上来看，各部门特别是做经济工作的人，都要依靠党、依靠群众。各部门工作条件不一样，各部门对自己的业务比较熟悉，党和群众对这些就不那么熟悉。可是工作要依靠党，依靠群众，这就要向党和群众作宣传，使他了解，不了解就不能依靠，所以工作中要有文件、报告。要达到宣传的目的，就要讲究方法，使对方能够懂，要合乎三个要求：

(1) 要引人看，要有好的介绍方法，要有吸引人的力量。毛主席常讲，文章的题目和头几句话很重要，首先头几句就给人家的印象不好，人家就不愿意看。不仅引人看，还要人家能够一口气看到底。

(2) 要使人看得懂，人家看不懂或不完全懂，就看不下去，看下去了也难得动员他。似懂非懂，目的就达不到。

(3) 要能说服人、打动人。如果看完了、看懂了，说服不了人，还是达不到目的。

道理是很明显的。当我们写文章的时候，总是以为自己的道理是对的，要使人相信，就要说服党和人民群众。我们不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采取说服的方法，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写文件也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懂你不懂，就有了矛盾，就要处理，就要用道理说服人，不但说服人，还要能打动人，说服着重在理智方面，打动人除了理智方面还带有一点感情，使看的人真正被你动员起来。

文章如果不合乎上面三点要求，写了人家不看，不能说服人，打动人，文章就等于没有写，就达不到依靠党和依靠群众的目的。我们作工作希望得到党委的同意和支持，但文章党委没有看，或者看了没有懂，党委就不能了解和赞助，群众就动员不起来，这样政府各部门的工作就会陷于孤立的状态。孤立无援，得不到党和群众的支持，就会犯错误，即使工作方针意见是正确的，也会犯错误，因为你脱离了党和群众。写文章一定要讲究方法，才能达到政治的目的。为了使党和群众了解和支持我们的工作，为了动员群众，这是个政治问题。这个问题不是主席这次的“六十条”才提出的，很早以前就再三提出过。为了使大家回忆起来方便，我在这里提一下：主席1942年2月写的“反对党八股”中的八条罪状，里面有几句话现在还是适用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第二条罪状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这两条情况现在少一些了。第三条罪状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毛主席说：“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我们和无论什么人做朋友，如果不懂得彼此的心，不知道彼此心里面想些什么东西，能够做成知心朋友么？做宣传工作的



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沒有調查，沒有研究，沒有分析，乱講一頓，是万万不行的。”所謂做宣传工作的人，我們在座的所有的人都是作宣传工作的。向中央写个报告，是在向中央宣传，向毛主席写个报告，是在向毛主席宣传，乃至向中央講几句话都是在作宣传。作宣传就要看对象，要作解释。不管人家懂不懂，一直講下去，就是不看对象，这个批評，現在还适用。第四条罪状是“語言无味，象个癩三”。这个批評，对于我們今天來說在很多方面还是适用的。語言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要向人民群众、向外国語言、向古人語言学习。第五条罪状是“甲乙丙丁，开中藥鋪”。文中說：“……写文章、做演說、著书、写报告，第一是大壹貳叁肆，第二是小一三三四，……一篇文章充滿了这些符号，不提出問題，不分析問題，不解决問題，不表示贊成什么，反对什么，說来說去还是一个中藥鋪，沒有什麼真切的內容。……单单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使用一大堆互相沒有内部联系的概念，排列成一篇文章、一篇演說或一个报告，这种办法，他自己是在做概念的游戏也会引导人家做这类游戏，使人不用脑筋想問題，不去思考事物的本质，而滿足于甲乙丙丁的現象罗列”。……第六条罪状是“不負責任，到处害人”。“拿洗脸作比方，我們每天都要洗脸，許多人并且不止洗一次，洗完之后还要拿鏡子照一照，要調查研究一番，生怕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你們看，这是何等地有責任心呀！我們写文章，做演說，只要象洗脸这样負責，就差不多了”。这些话对我們今天研究問題是有意义的。这篇文章是1942年写的，离現在已有十六年了。

其次，1951年2月，中央會发出“中央关于糾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等文字缺点的指示”，指示里面說：“現在党政軍来往电报及其他报告、指示、决定等文件，写得好的，确实不少。这些电报或文件，写得清楚明确，生动活泼，使人便于閱讀，发生极大效力。但同时尚有許多文电，在文字上存在着严重缺点，必須予以糾正。这些缺点之最常見者，有濫用省略、句法不全、交代不明、眉目不清、篇幅冗長五类，茲分別規定糾正办法如下：

(一) 不許濫用省略。……例如“上海”不得写成“沪”，……凡月日時，概用普通数字，不得用地支和韻目。……凡是特別生僻的語詞，其意义为多数閱讀者所不能了解者，应作必要的注释。

(二) 必須遵守文法。电报文句虽应力求簡洁，但不得違背文法。必要的主詞、述詞、宾詞，必須完备无誤。单句、复句，必須分清。代名詞，必須紧跟所代的名詞。形容詞、副詞詞尾，尽可能分用“的”、“地”，加以区别（形容詞是形容名詞的，例如“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資本主义”，故在名詞之前用“的”字区别之。副詞主要是形容動詞的，例如“坚决地打倒帝国主义”，故在動詞之前以“地”字区别之）。如此，方能使条理分明，意义确定。至于信件和公布的文件，不但文字应当完全，标点亦須正确。为解决此一問題，……望地方县委、县政府以上、軍隊师以上負責干部，至少有一人学会文法，以便負責修正文电字句。

(三) 糾正交代不明的現象。……每件事都要交代六个“什么”，即什么事、什么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样子、什么原故。仅在絕對明了时，始可有所省略。

(四) 糾正眉目不清的現象。除簡短者外，一切較長的文电，均应開門見山首先提出要点，即于开端处，先用极簡要文句說明全文的目的或結論（現在新聞学上称为“导语”，亦即晋代陆机“文賦”中所謂“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的意思），喚起閱者注意，使閱者脑子里先得一个总概念，不得不繼續看下去。然后，再作必要的解释。……

(五) 凡文電必須認真壓縮。各級領導同志責任重大，事務繁劇。向領導同志或機關請示或作報告時，必須反對兩種傾向，即應請示報告而不請示報告的傾向和不應請示報告而隨便請示報告的傾向。在寫請示文電或寫報告時，必須注意文字的簡明扼要，條理清楚，便於閱讀。現在有很多文電，既嫌冗長，又嫌雜亂。其原因，是未經壓縮，說了許多無須說的空話，或者沒有分清條理，把雜亂無章的草稿隨便往上送。其結果，使領導同志對這些文電很難看，或者就沒有看，等於白寫。今後一切向上級機關請示或報告情況和對下級發布指示的文電，所有起草和批閱文電的同志，必須以負責的精神，至再至三地分清條理，壓縮文字，然後發出，否則應受批評。但壓縮是指分清條理，去掉空話，並不是說可以省略必不可少的詞類，可以違背文法，也不是說可以不顧文字的形象性和鮮明性。有些寫得好的報告，雖然篇幅頗長，卻能引人閱讀，使人不厭其長。有些寫得不好的報告，雖然篇幅不長，卻使人難看。這裡的區別就在是否有条理，是否說空話和是否合文法。……這是1951年的指示。另外，主席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書中，對中共貴州省綏陽縣委宣傳部寫的“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加了這樣的按語：“這篇文章寫得很好，值得向每個黨和團的縣委、區委和鄉支部推薦，一切合作社都應當這樣做。本文作者懂得黨的路綫，他說得完全中肯。文字也好，使人一看就懂，沒有黨八股氣。在這裡要請讀者注意，我們的許多同志，在寫文章的時候，十分愛好黨八股，不生動、不形象，使人看了頭痛。也不講究文法和修辭，愛好一種半文言半白話的體裁，有時廢話連篇，有時又盡量簡古，好象他們是立志要讓讀者受苦的。本書中所收的一百七十多篇文章，有不少篇是帶有濃厚的黨八股氣的。經過幾次修改，才使它們較為好讀。雖然如此，還有少數作品仍然有些晦澀難懂。僅僅因為它們的內容重要，所以選錄了。那一年能讓我們少看一點令人頭痛的黨八股呢？這就要求我們的報紙和刊物的編輯同志注意這件事，向作者提出寫生動和通順的文章的要求，並且自己動手幫作者修改文章”。末了兩句話是對編輯講的，按剛才的電報上說的，所有黨組書記都要作編輯工作。

我把毛主席的話重說一下，一是為了便於大家回憶，一是為了說明中央提出這個要求不是新的問題，而是曾經多次提出過，真正是三令五申，恐怕不只是三令五申，而是五令十申了。可見這不是一件小事，而是政治性的問題，把這個環節搞好很重要。我們不是要做促進派嗎？如果我們把文件搞好一些，使中央早下決心，及時動員群眾來做，就可以把工作干得更快、更好，就可以做促進派。否則就不能多快好省，就是違反了多快好省的要求。當然不是說文章寫得差一點就什麼工作也不能作了，而是說作用要差一點，使本可發揮更大效力的文章，不能得到發揮。這是不是因為毛主席會寫文件、會詩詞歌賦而產生的偏愛呢？不是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傳統，因為我們作群眾工作，要向人民負責任，要向人民宣傳，要發動群眾、說服群眾，必須把文字工作搞好。關於馬克思，法國有個作家叫保爾·拉法格，是馬克思的女婿，他寫的“憶馬克思”的文章中說：“馬克思永遠是非常認真慎重地工作。他所引証的任何一件事實或任何一個數字都是得到最有威信的權威人士的証實的。他從不滿足於間接得來的材料，總要找原著尋根究底，不管這樣做有多麻煩。即令是為了証實一個不重要的事實，他也要特意到大英博物館去一趟。反對馬克思的人從來也不能證明他有一點疏忽，不能指出他的論証是建立在受不住嚴格考核的事實上的。”

“參考原始資料的習慣使他連最不知名的作家都讀到了，只有他才引用這些作家。‘資本論’里引証了那麼多無名作家的話，人們也許會以為這是在炫耀自己的學識淵博。但馬克思



却决不是出于这种动机。他說‘我执行历史的裁判，給每个人以应得的奖励’。他觉得指出第一个发表某一种思想或把这种思想闡述得比任何人都更为精确的作家的名子（不管这个作家是多么不重要和多么不知名）是他的責任。

“馬克思对待著作的責任心，并不下于他对待科学那样严格。他不仅从不引証一件他还未十分确信的事实，而且在他尚未彻底研究好一个問題时他决不談論这个問題。他决不出版一本沒有经过他仔細加工和認真琢磨过的作品。他不能忍受把未完成的东西公之大众的这种思想。要把他沒有作最后校正的手稿拿給別人看，对他是最痛苦的事情。他的这种感情非常强烈，有一天他向我說，他宁愿把自己的手稿燒掉，也不愿半生不熟地遺留于身后。”这是說馬克思著书，与我們工作中写文件还不一样，但可从这里看出他認真的精神。

关于列宁，列宁的夫人克魯普斯卡婭有个“向列宁学习工作方法”的小册子，着重講列宁如何写文章，其中有一篇說列宁是党刊底編輯者和組織者，她說：“究竟列宁注意編輯者工作的哪些方面，这可从他于1913年致卡斯帕洛夫同志的信中看得出来。卡斯帕洛夫給教育杂志写了篇关于民族問題的文章。依里奇写信給他說：‘亲爱的同志！你的文章我已收到并閱讀过了。据我的意見，主題选择得很好，發揮亦頗正确，但文艺上的修飾还欠工夫。有过多的——不知是否可以这样說？——不适宜于討論理論問題文章的（鼓动）閑話。据我的意見，或者請你自己再改作一遍，或者由我們来試試。’这样，选择主題，發揮主題，文艺上的修飾，这就是依里奇极为注意的三大要素”。“文艺上的写作方法問題。文体应与內容相呼应。文章的語言和腔調应适合文章底論者。写作，这是一种艺术。腔調、体裁，善于生动地叙述、进行必需的比較，这是很重要的。依里奇对写作方法問題賦予了极大的意义，他在自己的語言和自己的体裁上用了极大的功夫。他能一連坐几个鐘头去翻閱各种各样的字典，連达尔底字典也在內，最后一个时期他特別关心于这一字典的再版問題。依里奇的文字是很丰富的，他使用了許多民間的成語和字句。依里奇在从流放处致阿里克雪里罗得的信中說，——我最愿意的，是要学会写工人讀物。在我从流放处写給列宁母亲的一封信里曾描写依里奇如何在这个工作上利用我的帮助；有时我应把自己装成象一个既不懂外国術語和科学術語，也不懂某些人所共知事物的‘无知’讀者。”可見馬克思、列宁对待写文章的态度都是非常認真的，毛主席是繼承了他們的作风的，毛主席的作风是与他們相一致的。馬克思主义者着重这个問題是合理的。我們写的文章关系到国計民生，关系到社党早下决心，作出判断，作出决定，发动群众，使群众懂得各方面的利害，按照党的要求积极地去。为要达到这些目的，就要認真注意，把文章写得好一些，这是一个政治問題，是中央一再強調的，無論馬、恩、列、斯，都很注意这个問題。

## 二、准确性、鮮明性、生动性的問題

六十条中提出了这个要求。这个問題恐怕講不好，要講好，非得好好研究一下政府的文件，从文件发出的效果看哪些好，哪些是受过批評的，才能有的放矢。这个問題，各部門自己研究可能更容易一些，我現在只能說一下对这个問題部分的想法：

### 1. 准确性的問題：

这个問題在“六十条”中的第37条已有了說明。“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推理問題，这些都是邏輯問題。現在許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邏輯性；第四、不講究詞章。”概念、判断、推

理是邏輯學上的三個名詞。概念相當於詞，判斷相當於句，推理相當於兩個以上的句子。如茶壺是個比較簡單的概念，容易明了，容易準確，還有抽象的概念，如“多快好省”、“反冒進”就比較複雜、比較抽象，名詞固然可作概念，形容詞也可變為概念，轉為名詞。概念是客觀存在的事物，“多快好省”是事物的狀態，是客觀存在的，概念是不是明確，要看我們說的話是否符合所代表的客觀的東西，一句話可以代表好幾個概念，代表的範圍大小不同，這裡指這個，那裡指那個，完全不同或者部分不同。人的思想基本的工具是概念，如基本建設離不了幾樣材料——概念就是基本的材料，基本建設的材料，無非是木材、鋼材、水泥，一句話無非是概念組成的術語，肯定或否定，好或不好。“高速度”，究竟怎樣才算高速度，是對什麼東西說的，離開了一定的範圍說高速度就不明確。

判斷，有了幾個概念就可以作判斷，如茶壺需要大量生產，大量生產就是個概念，這個概念，比較簡單。再如每縣搞發電廠，這就是個判斷，縣是抽象的，不一定代表哪個縣，可以代表通縣，也可以代表別的縣，通縣也還是個概念，還不知道在哪个村莊，搞發電廠也是個概念，要什麼不要什麼，什麼對什麼不對，這就是判斷。判斷對不對，就要看先後次序對不對，有沒有條件，有沒有可能。

推理就是從這一句話引導到那一句話，由第一句話引到第二句話，第一句與第二句之間的關係就是推理，有時兩句話沒有推理關係，但很多時候有推理關係，就譬如六十條中的37條所說的這一段話：“現在許多文件的缺點是：第一、概念不明確；第二、判斷不恰當；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斷進行推理的時候又缺乏邏輯性；第四、不講究詞章。看這種文件是一場大災難，耗費精力又少有所得”。這就是推理。緊接着又說：“一定要改變這種不良的風氣”。這也是推理，既然是大災難，當然就要改變。下面是“作經濟工作的同志在起草文件的時候，不但要注意準確性，還要注意鮮明性和生動性”。這也是推理。下面是“不要以為這只是語文教師的事情，大老爺用不着去管。重要的文件不要委託二把手、三把手寫，要自己動手，或者合作起來做。”這也是推理，這裡有許多論證省略了，因為完全可以看懂所以省略了，如要說得完全，大致是：既然這麼重要，大老爺就用得着管；既然大老爺用得着管，無非是說二把手三把手不能完全解決問題，對問題不能完全熟悉，或者如果僅僅委託二把手三把手來搞，自己不去講究這個問題，不去注意這個問題，自己的思想也就不能清楚……等等的意思。

關於準確性的問題，即概念、判斷、推理的正確與否的問題。準確性包括兩方面，一方面要看概念是不是明確，判斷推理對不對，個別簡單的東西也有判斷，看字句對不對，數目字是不是有錯的，再來肯定或否定，或者是看推理對不對，這是形式邏輯裡面講的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的問題，蘇聯出版了一批這樣的書，有蘇聯人寫的，也有中國人寫的。比較薄的本子還不太難看，可以找來看看，看不懂也沒有關係，看總比不看好。

同一律是指說了一個概念，不要在另外的地方改變，一個概念代表的客觀事物不要改變，第一句話說了一個東西，第二句話又說了另外一個東西，就不好推理，說張三就說張三，不要前面是張三，後面又不是張三。

矛盾律是指張三那件事是做得對的，不要在另外一個地方又說是做得不對，說是星期三，不要又說是星期四。

排中律是指對的還是不對，好的還是不好，要是非分明，不能說好又不好，對又不對，或者不說對，也不說不對，是非不分。



充足理由律：判断也好，推理也好，理由要充分，要使人駁不倒。这是指对个别的事物。

还有一方面是比較大范围的事实的判断，涉及根本立場、方針、方法。涉及簡單的問題是形式邏輯，涉及到复杂的問題，即涉及到整个馬克思主义的理論，涉及到历史唯物論、辯証法、階級立場、社会主义立場等等。

因为“六十条”在这个地方講准确性，比較着重写文件，所以比較起来，沒有着重談事物的主流、支流，沒有談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問題，沒有着重談对大量事物的本質如何分析，因为別的地方已經講得很多了。

搞文件，首先要基本立場、观点、方法正确，如果基本立場、观点、方法不对，即使有个别的判断、推理是正确的，也不能挽救这一篇文章，使其由錯誤的变成正确的。这是要注意的根本性的問題。方法首先要分析正面反面，挑出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的两个主要的側面，这是根本的方法。至于每句話的判断、推理的关系，也是邏輯，属于形式邏輯。

总之，写文章首先要講辯証法，同时还要講形式邏輯，两样东西并用。

## 2. 关于鮮明性，可以从两方面來說：

(1) 观点和材料的統一。写文件与写小說剧本不同，鮮明性的要求不同，关键是观点要突出。写文章無論是对上、对下、对内、对外，都是为了宣传一个观点，观点是个判断，是推理来的，推理是从材料来的。所以，要鮮明首先要看观点和材料是否統一。如果观点和材料不統一，就象毛主席在工作方法六十条的第32条中說的：“把材料和观点割断，講材料的时候沒有观点，講观点的时候沒有材料，材料和观点互不联系，这是很坏的方法。只提出一大堆材料，不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說明贊成什么反对什么，这种方法更坏。”写文章用材料为了說明观点，文章写出来叫人家看不清楚，就是不鮮明，就是材料和观点沒有联系好。观点是結論，材料是前提，是論据，論据要說明观点，每个观点應該接着有事实作証明。不能証明观点的事实就不要用。每个論点有論据，这是推理問題，从鮮明性來說，观点和論据要摆得合适。一个建筑要有材料，有結構，整个建筑还要有設計。写文章和盖房子一样，要看如何布局、設計，是否經濟、合理、实用。观点和材料隔絕了，就象工厂的車間和原料离得很远，甚至中間隔了一道墙一样。如果說有些文章材料、观点互不联系，也是冤枉，他自己可能以为材料和观点联系了，但是离得太远了，太嚕叻了，或者不清楚，材料就不能說明观点。观点和材料，結論和論据要紧密結合起来。中国关于写文章有句老話：“夹叙夹议”。议就是观点，叙就是材料。事实和观点要安排好，一段話要說明一个观点，要有相当的材料来証明这个观点，这段話就鮮明，看起来就干净。如果一段話只有很多观点，或者事实很多，沒有观点，看了以后就迷失方向，不知道要作什么。所以，观点和材料的統一的首要的关键。

主席提出两个文件，一是少奇同志給中央的信，一是广西的报告。如少奇同志写給中央的信，为什么看起来很清楚，因为他提出的观点都有事实作証据，事实也是为了說明几个观点。一个是說紅薯好吃，有事实。一个是說紅薯是高产作物，对解决当前粮食問題大有帮助。現在有什么問題？河北省需要向外銷的問題，这个問題不但是河北省的問題，是全国的問題，要向全国推广，难于調运和保存的說法是不正确的。这就是夹叙夹议，作到了观点和材料的統一。材料和观点要統一不难作到，只要有意识地注意就不难。人的观点不論正确的不正确的都是事实的反映。写文章无非是为了說明观点，要使人相信这个观点，就要講些事